

伊斯兰教与世俗化问题再思考

吴云贵

内容提要：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社会文化形态，它与人类社会是双向互动的。社会生活世俗化与社会宗教道德规范化、制度化，在任何人类社会都是互有联系和区别的现象。本文以伊斯兰教历史上三个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为线索，就其与世俗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些学理上的梳理。

关键词：伊斯兰教 世俗化 历史 理论

作者简介：吴云贵，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引言

“神圣”与“世俗”是现代宗教学研究中使用的一对基本词语概念。“神圣”指各种宗教信仰和崇拜的神明，表达了人们在心灵、情感上对超自然神明的诚信和崇拜的信念。“世俗”指的是人世间，即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宗教社会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人类宗教多种不同的形态、趋向和功能，都曲折地映现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在不同时空、不同境遇下的意志、情感和追求，是人类自我的“影子”。宗教与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关系格局提示我们，宗教作为社会机体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超脱社会之外寻求某种“纯而又纯”或独立发展的最高境界。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问题，是各大宗教在发展进程中普遍需要认真思考和妥善应对的课题。本文侧重于研讨伊斯兰教与世俗化问题，但笔者希望将这一问题视为普遍性的课题，而并非伊斯兰世界特有的问题。

这里提出“三个意识”之说略予讨论伊斯兰教与世俗化问题。其一，比较宗教学意识。当今世界宗教的基本关系格局是多元主义。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人们在观察与思考宗教现象时，既要关注某一宗教现象的特殊性，又不应忽视某些共性。比较宗教学以宗教多元论为基础，便于人们通过比较分析，深化对宗教整体性的认识。例如，有些学者根据伊斯兰教“两世吉庆”之说，经常用“入世宗教”对之加以界定，同时又把偏重精神修持的佛教称为“出世宗教”。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得体，还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见仁见智的讨论。又如，在如何看待与世俗化相关的现代主义问题，同属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基督教的主流思想对西方现代主义采取接受和赞扬的态度，而后者则把现代主义视为殖民主义文化遗产加以批判和排拒。其二，历史意识。将现实的问题提升到历史的高度加以研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问题的基本要求。世俗主义、世俗化等概念是现代西方宗教学家首创的，但神圣化与世俗化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应当在历史主义大前提下讨论宗教与世俗化问题，而不应当将这一问题局限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讨论。三是现实意识。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根源，在于人类企图通过宗教信仰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因此，探讨伊斯兰教与世俗化问题需要确立“问题意识”，密切关注当今世界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各种热点问题。现实问题是宗教研究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关注点之一。

伊斯兰教与世俗化问题，并非一个全新的课题。以往我在著述伊斯兰教史学、教法学著作、论述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过程中都曾从不同角度涉猎过这一课题。^[1]只是没有将它作为一个专题，从理论高

[1] 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度予以系统的讨论,由此才有“再思考”的必要。由于这一问题涉及的时空范围过于宽泛,这里从伊斯兰教 1400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时间节点作为对论题范围的界定。

一、伍麦叶王朝末期至阿巴斯王朝初期:世俗化与伊斯兰化起点

在近代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下,“世俗化”一词,原指权力的转移,即把原属于天主教会控制的领土和权利转让给世俗的欧洲地方统治者。这是 30 年宗教战争导致的一个结果。在其后的演进中,世俗化泛指宗教观念、宗教感情的淡化,宗教活动领域的缩小,宗教社会功能的减弱和转化,宗教价值的失落现象。概而言之,世俗化可理解为宗教功能被非宗教社会功能取代的过程,即宗教与非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此消彼长的一种态势。这当然是宗教势力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状态。

不同于近代欧洲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最初对社会世俗化的回应是同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相联系,而且正是在“新桃换旧符”的过程中确立了伊斯兰教的体制,同时也使新兴的伊斯兰教成为构建理想社会的神圣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从此,社会世俗化与虔诚的宗教学者阶层代表社会良心反对世俗化而倡导伊斯兰化,几乎成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

长话短说。伍麦叶王朝(661~750 年)是以伊斯兰教名义创建的一个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称哈里发(真主的代治者),以宗教名义统治臣民。王朝统治后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民众起义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一批虔诚的宗教学者也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来。他们以各地的寺院为活动中心聚集在一起,从宗教道德的角度议论朝政,宣泄对统治者的不满。他们议论的中心话题是以宗教道德为依据,规范和约束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他们抨击统治者的世俗化倾向,抱怨当时的司法审判有悖于宗教教义,同时要求以宗教道德为尺度审查和修正当时的民俗习惯和行政惯例。由于这种民间学术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和色彩,因而当旧王朝被新兴的阿巴斯王朝(750~1258)推翻后,这批宗教学者因其宗教学识受到赏识和重用。为确立政治合法性,以宗教名义推翻旧王朝的阿巴斯家族宣称其使命是构建以真主天命为指导的伊斯兰社会,以建立“真主在大地上的统治”。而熟悉圣训和伊斯兰教法的宗教学者则成为反对世俗化和推行伊斯兰化的精英和骨干力量。

自阿巴斯时代起,社会生活愈益丰富多彩,外来思想文化不断对穆斯林的知与行产生广泛影响,世俗化与伊斯兰化成为相辅相成的两种社会思潮,反对世俗化而鼓吹社会生活伊斯兰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宗教知识精英,诉诸的基本工具是称之为“沙里亚”(真主之道)的伊斯兰教法,以构建理想的、以真主的天命为指导的伊斯兰社会。因此,教法实施的程度可以视为社会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衡量尺度。但伊斯兰教法包容性很强,具有很大的弹性。以民法为例,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通常被视为俗事俗物,但其相关规定正是伊斯兰教法的主体。“僧俗不分”、“两世吉庆”,模糊了神圣与世俗的区隔和界限,使世俗化与伊斯兰化几乎成为同一件事物两个不同的方面。

在政治思想领域,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伊斯兰化的直接后果,是使伊斯兰教法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同时也使宗教学者成为社会舆论的代言人。根据“圣训”,宗教学者自称先知的继承人,成为教法的权威解释主体,其对统治者的确认,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宗教学者不仅承认符合惯例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君的合法性,也经常确认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地方割据苏丹政权的合法性,认为混乱无序的无政府主义比军政强人专制危害性更大。足见神圣与世俗并无明确的界限。

二、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与奥斯曼帝国解体:民族主义掀起世俗化新浪潮

在漫长的伊斯兰教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及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今天之所以还要回忆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理论就在于不弄清楚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基本态度,就无法厘清伊斯兰教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今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所选择的“脱亚入欧”道路以及政教分离和世俗化方向，实际上是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指明了方向。而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思想是在尊重土耳其人民的选择的同时，对凯末尔主义持某种保留态度。特别是那些思想观念保守的民众乃至宗教知识精英，他们大都对土耳其所遵循的世俗主义方向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土耳其革命胜利后，特别是二战以后，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的解放运动在亚、非地区勃然兴起，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关系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以此为主题，在世界各地发表了大量论著和其他文献资料。由于凯末尔主义及其后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事实上已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世俗化运动的主要推手，因此伊斯兰教与世俗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如何认识和看待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凯末尔主义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共有六方面内容，涉及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里仅就与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要点略予评述。

第一，共和主义。革命胜利后，凯末尔主义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以共和国体制取代了以伊斯兰教为政治合法性的哈里发封建君主制度。国家体制割断了与宗教的联系，伊斯兰教不再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这是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

第二，世俗主义。革命前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实行世俗化旨在消除和削弱宗教对公共生活的广泛历史影响。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废除宗教法庭、关闭苏菲道堂，用西方戈里高利历代替伊斯兰教历，将穆斯林周五聚礼日改为全民公休日等。

第三，民族主义。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是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基础多民族国家，以共同的信仰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革命后的土耳其决定以土耳其民族认同作为国民性的基础，代替宗教认同，这一改变旨在使土耳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也是为消除宗教政治影响而采取的必然措施。

第四，改革主义。凯末尔主义坚信只有坚持改革方向，土耳其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凯末尔制定的改革计划，要求国人不断解放思想，反对保守僵化。其改革计划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制度、文化教育、妇女解放等诸多方面。改革的指导原则是现代化、世俗化，即全盘西化。^[1]

凯末尔主义坚持世俗民族主义并对伊斯兰教采取严厉限制的政策，反映了在社会体制急剧转变过程中的政治需求。但如果说“革命可以改变一切”，那么也应当看到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革命时期施行的激进政策会适时进行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起，土耳其进入多党政治体制时期，选举政治的需要使世俗化政党不得不联合那些初试身手并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宗教性政党，从而放宽对伊斯兰教政治诉求的限制。民族秩序党、民族拯救党、繁荣党、美德党以及如今组阁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都是在多党制和选举政治体制下兴起的温和伊斯兰教政党。它们在不挑战共和体制前提下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事实表明，在今天的土耳其，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世俗化与伊斯兰化，都是有弹性和限度的。

二战后，民族主义掀起的世俗化浪潮在阿拉伯世界有强烈反响。纳赛尔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同样是在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兴起的世俗民族主义。较之凯末尔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似乎有三点明显区别：一是在政治上具有反西方倾向；二是在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上主张限制与利用相结合。三是没有旗帜鲜明地宣布以世俗主义为方向。

在政策层面，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世俗主义理念有三个特点引人注目。第一，践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国家一般都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是国家居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或是最高指导原则。第二，国家施行事实上的政教分离原则，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与宗教无涉。第三，国家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禁止以伊斯兰教名义组建政党或政治组织。

三、20世纪70至80年代：世俗化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再思考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契机，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在西亚、北非、

[1] 详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南亚等地蓬勃兴起，引起广泛关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复兴并非一场统一的运动，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原因也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除了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根源外，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社会愈益世俗化所引起的不满、抗议和反弹是导致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共同原因之一。

一位资深的巴基斯坦学者当年在论述和向西方公众介绍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的性质和兴起的根源时，着重从欧洲殖民统治造成的生存危机和历史困境来思考。他强调世界穆斯林和大众因近代西方的殖民化造成的历史困境，以世俗化的负面效应最为根本和重要。世俗主义试图将一种与伊斯兰教世界观、价值观全然对立的新社会伦理强加于穆斯林社会，从而颠覆了穆斯林所熟悉的传统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根基。其突出表现在于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异化：在传统穆斯林社会体制下，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准则及整个社会的伦理准则都源自被视为神圣不谬的古兰经和圣训，而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完全无视这些。此外，世俗主义是凭借武力征服和殖民统治秩序强加给穆斯林社会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分裂以两方面最为显著。一是教育体制和方式的分裂。凡受到西方殖民统治影响的伊斯兰国家都存在教育双轨制，都因世俗国民教育与传统宗教教育的严重对立而受到困扰。二是领导角色和作用的分裂。传统领导阶层在世俗化浪潮中变得愈益保守，新兴领导阶层因在政治上亲近西方而受到赏识，但同时又在穆斯林大众中威信扫地，难以有效发挥领导作用。^[1]

如果说反对世俗化而主张社会重新伊斯兰化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所欲达到的一个根本目标，那么对其予以回顾和审视，也许会有助于深化对伊斯兰教与世俗化关系问题的认识。

在当今的穆斯林世界，经过时断时续、不同规模和形态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洗礼，社会生活在伊斯兰化和反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究竟有何变化呢？换言之，几十年风风火火的社会伊斯兰化最终取得了哪些实质性进展？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就这个问题做如下简短的评估。

首先，在什叶派伊斯兰教居主导地位的伊朗，由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社会生活伊斯兰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实质性进展。除穆斯林个体生活要恪守教法教规外，革命后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全面提升和加强，包括按照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意志颁布了世界第一部伊斯兰宪法，建立了由教法学家主政的伊斯兰政府，伊斯兰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等重大变化。但伊朗的“革命性变化”是特例，而非通例。

其次，官方主导的伊斯兰化一度在部分国家取得进展。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由民间自下而上发起的，但随着运动规模的迅速扩大，一些国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也介入了运动。利比亚军政强人卡扎菲、巴基斯坦军政强人齐亚·哈克、苏丹军政首脑巴希尔都曾在国内推行伊斯兰化运动。官方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举措尽管版本不同，但大都表现为以国家政权名义推行某种伊斯兰教传统，以争取政治主动。其中以强制推行称为“胡杜德”的传统伊斯兰教刑罚最为重要。但这种肤浅、作表面文章的政令、政策、措施，带有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动机，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和质疑。

第三，宗教思想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反对世俗化而鼓吹社会生活伊斯兰规范化、制度化，原本是各国宗教界在布道宣教中的一贯思想，但后来随着宗教政治反对派在一些国家兴起，这种主张和要求逐渐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甚至出现了某种泛化和极端化的倾向。在各国一批“伊斯兰主义者”（政治伊斯兰势力）的推动下，社会伊斯兰化这一伦理道德诉求开始演变为政治伊斯兰化诉求。这一引人注目的转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发了社会、政治动乱，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以“伊斯兰化”来抵制和反对社会世俗化，最重要的理论思考是：伊斯兰化是否有个限度，伊斯兰教自身如何才能与时俱进？这是伊斯兰世界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出满意回答的时代课题之一。

（责任编辑 格 尔）

[1] 约翰·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复兴之呐喊》，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Rethinking Islam and Secularization

Wu Yungui

Abstract: Religion as a social entity and a form of social culture is in a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 with the human society. In any human society, the secularization of social life as well as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ligious morality are different yet interconnected phenomenon. The paper presents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slam and secularization as shown at three characteristic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Islam.

Key Words: Islam, Secularization, History, Theory

Religious Charity: Great Expectations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of Views on the Encouragement and Normaliza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Involvement in Charitable Works

Jiao Ziwei

Abstract: Views on the Encouragement and Normaliza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Involvement in Charitable Works is an important policy document publish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in cooperation with several related governmental agencies. As a participant in the draf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 talks about its purpose, his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and his own understanding on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the document.

Key Words: Religions, Public Good, Charitable Works, Policy

Social Value and Influence of Buddhist Culture

Xue Cheng

Abstract: Buddhist culture has made magnificent cultural achievement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social rol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ultur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s the modern society matures, the defects of a culture of materialism are ever more eviden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is in the end a “crisis of human beings' self recognition”, a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limits of a materialism culture unable to transcend itself. The crisis can only be eliminated when the spirit of our culture is elevated to a new level, in transcendence of materialism. The inner transcendence of the spirit of culture must learn from rich and deep wisdom insights. This inward spiritual wisdom is particularly developed in an environment of Eastern culture. Wisdoms of the Oriental sages constitute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spiritual culture”. This orientation to the inner self will launch the third great revolution of the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Buddhist Culture, Social Value, Crisis of Modernity, Spiritual Culture, Spirit of Culture